



丁 涛

孟子见梁惠王之深意

孟子为梁惠王富国强兵开具“药方”，实为以“仁”为导向，充分借鉴魏文侯时期典型做法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势下，并非绝无施行的可能，因梁惠王未解其中真意，认为孟子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。从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中二人对话情况来看，梁惠王晚年似乎对魏国内外失衡、四面树敌的被动局面有所悔悟，而孟子则针对其所提问题，进行了诱导式答复，也看出其欲养蓄国力于内、外伸王霸之道于外的愿景设计，从具体内容来看，其主张的主旨并没有与魏文侯秉政时有太大出入，甚至与当时秦、齐、楚并向削弱魏国的大背景是高度契合的。

行仁义方能成就王霸之业

梁惠王“将有以利吾国”的提问，是当时各国君王功利心态的普遍反映，孟子先以义利之辨破题，点出如果人们都先考虑和伸张个人私利，那么必然是国将不国。其言“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”，并非危言耸听，当时“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”，诸侯之间赤裸裸地争城夺地、杀人无数，争夺资源之惨烈是空前的；孟子眼中“天下大乱”的根源是人人争利、贪得无厌，在较智力角中无所不用其极，这种状况确实背离了人伦基本底线，带来极大混乱，正所谓“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”，引起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不受掌控的私欲膨胀。作为国之首脑的君王，为功利所迷惑，一张口便言“利”，无疑是变相鼓励上下以追求利益为先，因此孟子“一破一立”，明确点出了君王但行仁义，而不必强调如何获利。

梁惠王纵情山水之乐时提问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指出“贤者而后乐此；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”的观点，进一步引申出“与民同乐”命题，认为国君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民众真心归附和认同，体恤民情、关注民意是与天下同乐的注解，是怀仁心、行仁义的外在表现，更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所在。

事实上，在魏文侯时，任用李悝修订《法经》六篇，以法令形式规范利益分配、稳定内部秩序，客观上避免了各势力之间相互争利的可能；推

行“尽地利之教”，奖励农耕，用“平糴法”调节谷价、备战备荒，保障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利益，使农业真正成为财富之源，此做法与孟子重农养民思想是高度一致的，都是从国家安全发展基本要素出发而作出的安排，由此被视作“仁”。

施仁政国力自然丰沛

梁惠王自认为对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，在天灾面前做了不少补救工作，但与邻国相比，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来，于是便就此询问孟子。孟子再次发挥了其过人的辩才，以战场上逃兵的“五十步笑百步”为引子，点出了君王包括其所称“邻国”在内，所作的补救措施没有抓住问题关键；进一步指出，从财富产生的源头着眼，尤其是滥用民力以致违背农时，自然从根上就无法平衡投入与产出的矛盾问题，国力无所增长，则是必然的事情。随即，又言“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”，保障基本民生才能物博财丰、民有所养，然后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”，自然能使内部安定、国力强盛，明确所谓“仁政”在于不违农时使民有所养、抚育百姓使其知孝悌，而非事后补救，或者以“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’”推脱责任。

魏文侯施行“仁政”方面，是声名在外的，如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，当时的劲敌秦国也认为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合”。其“仁”首先在于礼贤下士、广揽人才，师事卜子夏、田子方，礼敬段干木，这些看起来是务虚，却引来四方贤士归附，为魏国强盛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如吴起、任座、翟璜、李悝、西门豹、魏成、乐羊等文武之才，皆乐为所用。此外，还能以宽大胸襟礼遇敢于直言的忠义之臣，如乐羊攻克中山国后，魏文侯将其地封给自己儿子魏击，引起任座不满，当面指出魏文侯不配称为“仁君”，文侯对此表示愤怒，后经翟璜以“君仁则臣直”劝解，认为任座之所以敢于当面“顶撞”，就在于文侯行“仁”在前，于是魏文侯请回任座，亲自下堂迎为上客，打开了群臣乐进善言的通路。

以民为本方能“仁者无敌”

孟子所谈论“仁义”“仁政”，根本落脚在民本，而作为统治阶层，与民共情、体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理，则是改变暴政而回归人道的根本所在。孟子以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两连问，引导梁惠王思考如何为民父母的问题，按常理推断人们对“兽相食”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厌恶之感，更何况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”，简直是“率兽而食人”的恶行，以此鞭策点醒君王若使民众活活饿死则是最大的罪责。

换句话说，“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，壮者以暇日，修其孝悌忠信”，则自然能使民众“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”，认为君王不应高高在上、作威作福，而要通达人情，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，积极引导百姓按照“仁”的标准去修习，国家上下便会政通人和，民众能够自觉归附和认同，并心甘情愿为保卫这样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而去尽心尽力付出，更不用说满足梁惠王因失地辱国而“比死者壹洒之”的心愿了。孟子借此作为以有道伐无道“仁者无敌”的根本支撑，反映了赢取民心作为富国强兵根本支撑的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。

事实上，魏文侯时期以武力开拓疆域的同时，还尤其注意经济建设，如打破建立在血亲宗法制度上的世袭制，施行“食有劳而禄有功”，依据能力和功劳选用官吏，从而激发整个国家安全发展的活力；再如，任用西门豹治理原本贫瘠的邺地，借助打击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动，惩戒了地方恶霸势力，教育了广大民众，后引漳水并开凿12条水渠灌溉出大批良田，“寓兵于农、藏粮于民”，迅速使邺城民富兵强，成为魏国东北重镇。正是这些以发展民生为目的的举措，使魏国民间力量积蓄起来，民强而国富，由此奠定了魏国百年基业。



“心”学作为儒学的一个门派，最早可追溯到孟子。南宋陆九渊进一步发扬光大。至明朝，从陈献章倡导的涵养“心”性之说开始，儒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“理”学向“心”学的转变。

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教育家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。他一生探求和宣传圣人之道，积极加以推崇和发扬光大，潜心研究“心”学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。他说：“尽心知性，而后存养有所施焉。”尽“心”、知“性”，让自己内心得到涵养，方可展开合理的行动，进而安身立命。

在“心”学方面，张栻提出了主“心”、正“心”、存“心”、养“心”。

主“心”

自然界事物的运行规律，作用于人身即为性情。张栻肯定“心”主性情，认为“心”的作用为主，才会产生正确的思想。思想引导行为的开展，正确的行为动机就是所谓的“道心”。在主“心”方面，首先他将“耳目”之宰与“心”之宰进行了比较：“盖耳目为之主，则不思而蔽于物矣。耳目物也，以物而交于物……若心为之主，则能思矣。思而得之，而物不能夺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张栻认为学者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以“耳目”为主，则不能思考，容易被物所扰而丧志；如果以“心”为主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，获得认知与心得，稳定自己的性情与志向，才能渐臻佳境。其次，“心”应主“气”，张栻说：“心失其平，不必求于气，此特持心未固耳，务持其心而已。若舍心而求于气，则将见舍本事末，而无以制矣。”学者在自身修养过程中，应以“心”做主宰，舍“心”求“气”，则“志”不能固，反累“心”，本末倒置，将无正确的思想把控自己的行动。务“心”前行，固“志”稳“气”，自己有了既定的信念与目标，人生道路将会在责任感、使命感的催使下，越走越宽。最后，张栻认为学者在主“心”方面要按“理”而动，非以“物”而行。“理”即是事物的规律，是非得失的标准。学者以“物”而动，则容易流俗于性情，扰乱于私欲。以“理”而行，丢弃主观主义，顺天命而为，“心”将能够找准自己的行动方向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主宰作用。

正“心”

儒家学者修身的八条目为：“格物”“致知”“诚意”“正心”“修身”“齐家”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。意念诚实的人，才能心机纯正。心机纯正者，方能提升自身修养。正“心”是指除去各种不良的情绪和杂念，不为外物、诱惑所动，居敬穷理，心得其正，思得其稳。正“心”缘于“心”之偏。在张栻看

来，圣贤之书是治疗“心”病的良方。它理论体系详实，思想内容丰富，学者认真品读，可以检查自己“心”偏之缘由，找准病因，对症下药，去欲存理，进入“仁”境。好高骛远、一蹴而就者，若发现一剂“药方”，就如获至宝，终将阻碍自己前行的步伐，也不能祛除“顽疾”。张栻认为：“人能正其心，不使外物害之。”学者动机纯正，以正确的心思来驾驭自己的行动，不断审查自己，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，集中精神修养品性，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努力，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假若他心机偏离，外物的诱惑将不断干扰自己的学习与品行修养，心思散乱，行无定思，自己生活在虚无感、梦幻感的世界里，找不到自己前进的目标，结果会一事无成。

存“心”

存“心”是“知性知天”，在思想认识层面超越自我，存储涵养，不为世俗和思想杂念所困扰。张栻认为学者在道德修养时，不仅要主“心”而动、正“心”而行，还要存“心”而为。他说：“人虽有是心，而必贵于能存，能存而后人道立。”这句话告诫学者存“心”有助于彻悟天理，涵养性理，践行人道，进入君子之列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，不能“存”心行事，往往放“心”妄为。放“心”如同鸡丢出圈，不追不回，不免陷入无思考、无认知之地。跟随闲思杂念而行，错进小人之列。学者在存“心”过程中，张栻指出“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，则圣贤之门墙可渐而入也”。孔子把“仁”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、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。以“仁”德修行，化入内心，从而开展有意义的行动。以“礼”入世，契合于内，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。这样下来，求学者才能完善自己，朝着心中的圣人之路，大步迈进。

养“心”

养“心”是“养性知天”，它既强调学者顺性而为、穷理尽性，又指出其行动准则应与天道相吻合。张栻研究“心”学时，非常强调养“心”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牛山之木，其美者本然也，斧斤伐之，则不得为美矣。然木之生理固在，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润，而其萌叶不容不生。于其生也，又为牛羊牧之，于是有不得其生而常濯濯者矣。”张栻以日常所见的树木生长为喻，在阳光、雨露的浸润下，它们顺应植物生长的原理，得以茁壮成材。如树性不得其养，又遭外物的破坏，终究不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借物喻人，说明学者在自身修养时，同样也要重视养“心”，清除贪心和私欲，以纯正的思想涵养心灵，这样才能引领自己走上光明之路。

宋代张栻『心』学感悟

张连勇

针对养“心”，张栻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种方法。首先，以义理养“心”。义理是指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。古之贤者在动作起居、声音容色之间，均按义理行事。学者也应收仿贤人，将养“心”之思与义理之念巧妙地结合起来，从细微入手，以备修身之要。其次，寡欲是养“心”的核心要素。清心寡欲则血气稳固，思虑平和，因而内心宁静，注意力集中，行动有要领可循。学者“心”存多欲则思虑杂乱，心无所安，志向不能达之高远。

对学者“心”学的道德教育过程中，张栻指出“心”主性情，告知学者要稳固内心；正“心”而行，要求他们心机要纯正；存“心”知性，警示学者不要放“心”妄为；养“心”践道，要他们做到清心寡欲。张栻“心”学的道德修养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“盼至圣人”的培养目标。



“于青菜”是清朝廉吏于成龙的绰号，他在两江总督任上，每餐下饭主要靠青菜，时人称之“于青菜”。给父母官起绰号，虽是戏谑之词，更有褒贬之意，可见民与之近，与之亲。

于成龙清名素著，除了“于青菜”之外，“于糠粥”“于豆腐”“于半鸭”都是于成龙在各地工作时留下的名号。民谚说，“千里为官只为财”，但于成龙为官几十年，不管当了多大的官，其日常生活一直“稳定”地处于温饱线左右甚至以下，图个啥？是他能力太差，只会高谈阔论清正廉洁，毫无经邦济世之才吗？不然，这位不追求自己生活水平，也没有太多生活情调的“于青菜”，是严于律己、宽以待民，不仅是一位廉吏，更是一位能吏，不仅有想法，更有办法，尤其为公理财堪称一绝。

于成龙在入仕之前，理财之能就已牛刀小试。于成龙的祖上是“永宁于氏”，曾是富贵之家，明末清初乱世之际，于成龙这一支家道中落。面对重重困难，于成龙作为“家长”，承担起了重振家业的担子。他“率其佃仆，及时耕种，及时耘耨”，既是指挥员，也是战斗员，公平持正。于成龙勤俭当先，又颇有经济头脑，一边改进种植技术、精耕细作，一边逢低而入、不断扩充田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短短几年，于家重兴。于成龙离家为官之时，已为长子于廷翼留下

一份殷实的家业。

于成龙理家财，能振家业；理公财，更兴邦国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45岁的于成龙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，这在当时是穷苦烟瘴之地。于成龙在《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》中所记，“入县中，一如郭外，居民六家，茅草数椽”，真是满眼凋敝，何处话凄凉！即使一穷二白，于成龙仍爱民敬业，经济之事一丝不苟，履职奉公兢兢业业。他有大局，更重细节，征收赋税的时候，在大堂亲自坐镇，以防胥吏弄虚作假。除了例行公务，于成龙尤重体察民生疾苦，曾向当时广西巡抚金光祖建议改革盐务弊端，“禁官运”“革埠商”，加大支持“流商”力度，引入战略竞争者，重塑市场，还利于民，普惠于民。于成龙还建议，积粮备荒，平准均输，打击“奸商”。这些建议疏通了市场流动，以良政良策安抚民生，在实践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于成龙因为政绩卓异，屡被升迁至棘手岗位，犹如救火队长。他在福

“于青菜”理财记

崔 庆



建任上化解粮荒，尤为精彩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63岁的于成龙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。当时，清朝正在致力统一台湾，大批军队入闽备战。

兵马来动，粮草先行，福建作为战区，军需补给压力巨大。部分米商一心囤积居奇，企图大捞一把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因此，八闽尤其是重兵之

地泉州，米价飞涨、兵民交困，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初，海峡前线激战正酣，粮草短缺越发严重。情急之下，福建总督姚启圣带头捐出五千两白银，同时令下属各司道府捐足五千两，凑齐一万两白银，交由于成龙火速前往福州购粮。其实，当时福州形势也不容乐观，米价已经翻倍，涨至每石米二两一二钱左右。怎么办？大举买粮，必将再度推高粮价，还不一定买够足数；若不速购，数万人马嗷嗷待哺。

转变思路，才有出路。于成龙出人意料地反其道而行之，坚定地做粮米市场的“空头”，组织实施了一场惊心动魄的“多空搏杀”。经过精细测算和反复推敲，于成龙改购粮为“借粮”，沟通协调，筹集足够“头寸”。于成龙的“筹码”是从粮道手中暂借，原为官方储备的秋粮，一般轻易不能动用，但是于成龙的周密方案和拳拳之心打动了福建巡抚吴兴祚，一路绿灯。于成龙从闽县借粮一千石，从侯官县借粮两千石，又通过

各种渠道最终凑齐了五千石，先行运往泉州。接下来，外省粮食运抵福建，于成龙用这部分粮食补齐了官方战略储备，狠狠打击了市场“多头”的嚣张气焰。到嘴的鸭子飞走了，粮商原来的设想落了空，而且买卖双方局势已经发生逆转。由此，福州粮价不升反降，很快跌到了每石一两左右，市场“多头”经此一役灰飞烟灭。于成龙既救了泉州前线之急，又平抑了福州飞涨的米价，可谓一箭双雕。

于氏家训云，“我谓公道二字乃致富之要诀”。纵观于成龙理财之能，成功基石就是秉公持正，公私皆如是。仕途之初，离家之时，于成龙交代长子于廷翼，“我做官不管你，你治家莫想我”，可谓公私分明。仕途之终，于成龙“端坐而逝”，遗物仅为“绨袍一袭、靴带二事，瓦盆中粗米数斛、盐豉数器而已”，更可谓公而忘私矣。廉生明，也生智。秉公持正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节，驭之有方，理财岂能不善，家国岂能不兴！

古时廉吏多为能吏，方能镇守一方、造福一方。

人物志